



史海回眸

50年前“旱改水”

□程太和

近期，南通及如皋媒体上有不少关于50年前如皋人民“改天换地战高沙，全面实行‘旱改水’”的报道。50年前，经过如皋人民的艰苦奋战，终于使高沙土越种越肥，农作物产量越来越高，实现了早涝保收、稳产高产，为农业生产的可持续发展打下了基础。

我的老家住海安东乡，与如皋雪岸公社（乡）交界，50年前也经过了那场战天斗地的“旱改水”运动。

1972年，全国各地掀起了“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到处可见“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一年大干，二年大变，三年大寨”的宣传标语。“农业学大寨”，学什么？江海平原上，无山可开，无梯田可造。但江海平原上，高沙土多，沿海地区盐碱地多，这些土质只能长早熟作物，产量低。通州西北部、如皋西部、海安西南部属高沙土，如东东北部、海安东部属滨海地区的盐碱土，适宜生长水稻的土壤很少。在“农业学大寨”的群众运动中，这些地区提出了“削平高沙土（盐碱地），实行‘旱改水’，建设高产田”的响亮口号。我们生产队当时的队长叫程继贵，是我的堂叔，会计叫李炳宏，都是刚刚上任的生产队干部，在上级的号召下，根据我们生产队的实际情况，也掀起了“旱改水”，大搞农田基本建设的热潮。我们队有两处乱坟场、一处“龙扩田”，这些地方有大面积的无主坟，占据了不少土地。队干部首先带领群众铲平无主坟，将露出地面的棺材板用于生产队建仓库、建蚕室、建牛棚、建猪舍，修猪栏。平整了两处乱坟场、一处“龙扩田”，一下子就为生产队增加了可耕地六七十亩。接下来是开挖丰产沟、开挖丰产渠，实行“旱改水”。1971年之前，由于受到土质限制，灌溉能力限制，我们队每年水稻栽插面积只有五六十亩，开挖丰产渠后，一下子增加到120多亩，是往年的双倍。水稻栽插面积增大了，也带来了巨大的劳动强度，1972年基本上都是栽插的后季稻。后季稻的栽插是要抢季节的，必须在8月7日立秋之前栽插结束。人们为了抢栽后季稻，起早贪黑，早晨三四点钟就下田拔秧，饭食也用钢精锅盛着带到田头吃，抽水烟的中老年妇女，把水烟台带到田头，实在熬不过了，上田头吸上两口。就这样，到8月7日立秋时还有50多亩未栽插，到8月12日还有20多亩未插。8月12日晚上，大队决定，第二天调动全大队劳力到我们队突击栽插。这样，才于8月13日完成了当年120多亩后季稻的栽插任务。种田特别讲究“不误农时”。很显然，这年我们队的后季稻栽插误了农时。再加上这年的天气特别糟糕，后季稻的收成可想而知。根据地方气象史料记载，这年海安县全年307天阴雨，平均气温仅有14.10℃（常年为14.60℃），全年雨量1358.4毫米（常年平均1055毫米）。特别是9月29日，遭寒露风袭击，气温降低9℃，迟栽的后季稻正处于对气温特别敏感的幼穗分化减数分裂期，经受不了10℃以下的低温袭击，而产生“翘穗”现象。迟栽的后季稻就是受这次寒露风影响而颗粒无收。不仅我们队，我们大队，我们公社，我们全县也都有这样的情况。据《海安县志》记载，这一年，海安粮食总产量5.8776亿斤，比上年减产1.22亿斤，降幅17.2%，比历史上降幅较大的三年困难时期还要大。秋熟中，后季稻栽插面积扩大了，稻谷却比上年减产了34528公斤。不仅海安，如皋也是这样的情況。据《经典如皋》一书中相关文章记载，1971年，如皋县水稻栽插面积增至2.667万公顷，当年气温正常，获得大丰收，全县粮食增产8.5万吨。1972年，全县水稻栽插面积扩大到82万亩，部分晚稻栽插时间延迟到8月10日，因当年寒潮早到，部分水稻灌浆不足，产生“翘穗头”现象，“扛枪的扛枪，站岗的站岗”，导致大面积歉收，粮食总产低于1970年的水平。

1972年，那个战天斗地的鼠年，南通北三县人民为“旱改水”付出了巨大努力，作出了巨大牺牲。也为后来粮食的稳产高产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当年参加“旱改水”的年轻人，现在也七八十岁了，我们不应忘记他们。

征 稿

“城市记忆”设有传家宝、老照片、史海回眸、地名掌故、江海风物、老建筑、习俗杂谈等栏目，欢迎投稿或提供采访线索。来稿尽量图文结合。

投稿邮箱:574911059@qq.com

建在如皋黄家市的新四军“江南办事处”

□文龙



解放战争中,担任江南办事处主任的包厚昌(图左三)与粟裕在一起。



建国后,包厚昌曾担任江苏省副省长。

老照片

在江苏省如皋市江安镇的黄家市老街上，人们总是津津乐道于老街的一处革命战争年代的旧址，那就是江南办事处。江南办事处，曾先后是中共路东特委、中共澄锡虞中心县委、苏中六地委、中共京沪路东中心县委、中共澄锡虞工委的对外简称，设置在当时如西县边境的黄家市老街上。江南办事处隔江领导江南地区党的工作，采取军事、政治、经济等多种形式同敌人展开斗争，其威名如同春雷般震耳，响彻江南大地，使敌人胆战心惊，坐卧不安，使江南人民欢欣鼓舞，看到了光明和希望。

据《中国共产党江苏省无锡历史》第一卷（1925～1949）（下简称《无锡党史》）记载，1941年7月，日伪集结18000兵力对苏常太地区及对锡澄公路以东、铁路以北的锡东、锡北地区进行“清乡”。1941年8月14日，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对苏南东路反“清乡”斗争作了重要指示，指出：六师各旅团要以分区转移对付日伪分区“清乡”为指导原则。无锡地方党和政府根据上级指示，重新调整了反“清乡”斗争的部署；在组织上安排政治面目公开的党政干部撤离；在军事上，无锡反“清乡”支队及各区常备队武装人员限期去新四

军六师师部报到，随部队撤去苏北；在经济上，突击征收夏季公粮，一部分坚壁清野，防止日伪掠夺，另一部分转运苏北，以备后用；在政治上，散发《告民众书》，稳定群众情绪。

目前对于江南办事处成立的时间，《无锡党史》和《靖江革命斗争史》皆记录为1942年春，但据曾任江南办事处主任的包厚昌同志回忆，江南办事处成立的最早时间为1941年9月。当时，中共路东特委刚转移到江北，就在靖江县西乡（当时黄家市归靖江县管辖）设立了江南办事处，这应该是目前所有的资料记载中，江南办事处最早成立的时间。办事处由钱敏主持工作，主要是把从江南撤退出来的干部组织起来学习，伺机渡江南下。同时办事处也想方设法联系了一部分避往上海等其他各地的同志。

江南办事处，是中共锡澄虞地区革命史上一段无法磨灭的记载，是红色革命斗争史留给后人们的宝贵文化遗产。她是锡澄虞地区革命斗争的前敌指挥部。尽管机构名称、职能不断变化，但“江南办事处”这一称谓却一直沿袭，并始终发挥着前敌指挥部的作用。虽也曾因为隔江联系多有不便，办事处领导曾设想过江在沙洲建立一个隐蔽的前哨阵地，直接指挥江南斗争，但最终均未能找到合适的地点。江南办事处一直以黄家市为主要根据地，领导和

指挥锡澄虞地区人民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作出了关系锡澄虞地区革命前途命运的一系列重大决策。据包厚昌同志回忆，他曾于1942年2月、5月和1945年1月、6月先后率队渡江南下开展革命工作。尤其是二下江南时，13天打了15仗，其艰难和危险程度可想而知。至今，锡澄虞地区的人民群众依然传颂着包司令“四下江南”的英雄事迹。

她是锡澄虞地区革命斗争的大后方。无论是抗日战争敌伪“清乡”斗争最残酷的时候，还是解放战争国民党反动军警发动的几次重点“清剿”阶段，每当革命遭遇挫折、党的力量遭到一定程度的损失时，党的组织、部队及相关人员、家属总是能够及时撤至苏北，通过江南办事处，得到妥善安置。据《如皋人民革命史》记载，江南办事处还与如西县民兵总队在江安区的黄家埭附近合办军工四厂，生产手榴弹支援江南地区。

她是锡澄虞地区干部人才培养基地。江南办事处多次组织锡澄虞地区的党政组织骨干参加党员训练班和武工人员训练班，县区级干部分批到苏北参加整风学习，提高了政治、军事素质。1948年5月，江南办事处还向上级请示，从苏北抽调一定数量的干部充实无锡党组织和武工队的领导，培训了一批随军南下的骨干力量。1949年3月，在中共华中工委的领导下，更是组织了千余人的承担接管无锡任务的干

部大队集中培训，并随解放大军渡江南下，接管无锡。

黄家市位于如（皋）、靖（江）、泰（兴）三县交界处，地理位置相对偏僻，但黄家市老街上人来人往，是如靖泰三县交界处的贸易集散地，物资流通丰富，群众生活相对富庶，水运交通比较发达，向南通过靖江的夏仕港、新港、八圩等，即可渡江到江南。选择黄家市作为江南办事处的根据地，有较大的回旋空间，在政治上有理，军事上有利，交通上也相对便利。

黄家市南部即为靖江东部地区，日伪力量相对薄弱。距离黄家市不远处的中共靖江县委所在地腰湾沟康曾被誉为江北的“小延安”；同时靖东的新港，是苏北通往上海的商埠，通过做工作，根据地地下党人员、物资往来，均由新港通过，当时我们称新港为“自由港”。

据《如皋人民革命史》记载，1941年7月，苏中三分区地委、专署及三分区司令部移驻如西的周庄头村。而周庄头村离黄家市的江南办事处地点仅有几里地之遥。当时的如西境内，抗日民主根据地建设初具规模，特别是民兵自卫运动蓬勃发展。黄家市凭借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优良的军事、政治、经济条件，承担了锡澄虞地区党组织发展革命力量和建立战略支撑点的重任，成为领导锡澄虞地区夺取抗日游击战争和解放战争胜利的稳固而坚实的红色根据地。

其实，过去农户家更多的是将葫芦瓢用来舀面、挖米或盛其他粮食，所以那时在农村居民家中的米桶、面缸之类的盛粮器具里，大都放有一只大小适中的葫芦瓢，是专门用来舀粮食的。使用时间长了，葫芦瓢还自然成了一种粮食的计量器具。比如我家当年玉米屑缸里那只小葫芦瓢正好能装半斤玉米屑，而我家煮玉米屑粥时一般需用一斤玉米屑，于是家中大小孩子都知道，每次往锅里加米的沸水中间扬玉米屑时，只要挖两瓢玉米屑就够了。过去农户之间借米、借面或借其他粮食时，一般也都用葫芦瓢来盛放，只要借粮时和还粮时使用同一只葫芦瓢就行了。

如今，许多农村家庭放弃使用葫芦瓢，也很少有人家再种葫芦了，即使长了也都是作为观赏使用。

葫芦瓢

□杨汉祥

江海风物

现在每当看到有居民家中种植少量供观赏以及制作工艺品用的葫芦时，就不由得让我想起三四十多年前，在我们通东一带农村中随处可见而且用处多多的葫芦瓢。

所谓“葫芦瓢”，就是将成熟的葫芦采摘下来，并从其顶端往下对剖成两片，然后除净瓢内的籽与瓤，待风干后就成了一种不需花钱买却很理想的舀水、盛物器具。由于葫芦顶端细小狭长，而下部大而圆滑，所以剖成葫芦瓢后，其顶端处正好当作抓把用，其下部那半球状的空间则用来储水或盛物。虽然葫芦瓢不

如木制、塑制或金属制的器具牢固，但平时只要维护得好，用上七八年是没有问题的。当年，我家有一只用了多年后出现了一道裂缝，母亲就先用锥子在裂缝边沿挨着钻上小孔，然后用细麻线交叉穿进小孔，将裂缝连接并紧紧扎牢，过后那只修复好的葫芦瓢又用了三四年。

用葫芦瓢舀水不但每次取水适中，还干净又没有污染。用过后随手将其丢在水面上也不会沉入水底。下次再用时抓起浮在水面上的葫芦瓢也很方便，所以当时农村家家户户的水缸旁或水缸里，都摆有一只光滑洁净的葫芦瓢，人们都称其为“水瓢”。

过去在我家乡通东三余地区，农民凡在田间浇水施肥时用的那种长柄料勺开始都是木制的，后来也有塑料材质的，

但买一只价格都不会太便宜，于是有些农民就想到用葫芦替代。制作时先找一根两米长的细毛竹当料勺柄，接着在一只相对厚实的葫芦瓢抓把处两侧各打一个小洞，并用一根粗细适中的毛竹或小木棍从洞中横穿而过作为横挡，至于这根横挡插进后必须与瓢体之间连接紧密牢固。同时在瓢的顶端也就是抓手处锯一个凹口，然后把毛竹柄细的一端穿过顶端这个凹口，接着从那根横挡下面伸过去直抵“葫芦瓢”的底端。最后用铁丝将毛竹柄与瓢顶凹口处以及毛竹柄与横挡交会处牢牢扎紧，这样一只很结实的葫芦料勺就制成了。虽然这种料勺不如其他材质的料勺牢固，但毕竟花钱少，有的甚至不花钱，至于使用起来还格外轻巧，一旦用坏了再去装一只也很方便。

国。取信于君，取信于民，不是微小的诚信。宋代教育家、理学家、如皋胡瑗对诚信有着自己的见解。他于《〈周易〉口义》中系统地阐述诚信理念。譬如注解“圣贤推由中之信”，胡瑗告知天下士子，诚信发自内心，不容私人邪念，才可赢得世人的信任。胡瑗还批判文人：勤于著述，荒于实践。他言出必行，终身实践，忙于教育。胡瑗诚信的理论及实践，以及元明以降皋人诸族修订众多家谱，提倡为人敦厚，逐渐形成如皋诚信的理论源头及文化基因。如皋建学宫始于南唐。如皋的诚信理论史，早于建校史。时至明清明代，如皋又有大量乡贤，忠诚于君，爱戴于民——许直以死报国，冒辟疆散财赈灾，戴联奎拒贿权臣，冒小山拾金不昧，续写如皋乡贤守承诺、讲道义的良好佳话。

如皋乡贤的诚信还有宽度：引领时

代。相比封建时代诚信忠君的局限性，如皋近代诚信理念，融合东西方的诚信文化，实现华丽转身，更具现代性。这当归功于如皋近代化的第一功臣——沙元炳先生。他素以胡瑗为楷模，兴办教育，创办中国最早的公立师范之一——如皋师范，提出校训，共计四词，其中三个：“真实、醇和、沉笃”，无不涉及诚实、信任。他还继承家风，传承诚信。若说胡瑗是沙元炳最为推崇的乡贤，那么沙元调就是沙元炳最为推崇的先祖。这位沙元调教诲后人：规规矩矩对待下人，老老实实对待乡人。作为晚清进士，沙元炳思想未曾保守，他还与外国人交游，接受西方先进的理念。1921年，他致信韩国钧，直言企业家担当。企业家精神的基本准则，便是契约精神——守信。融合古今中外的诚信文化，沙元炳先生兴办实业、医院，追求诚信，造福乡梓。他创办

如皋第一家电灯公司。其间，部分外地股东因为南通籍经理贪污，纷纷撤资。危急时刻，他因诚信赢得新股东的认可，前后经过数年，筹集资金，坚持还清外地股东的股金，又恢复生产，确保古邑皋城的一片光明。令人感动的还有，他创办如皋第一家公立医院，也是如此。沙元炳先生在辞世前数月，仍为医院筹钱扩建忙碌。他贴出启事，以示诚意，募捐资金，完成心愿。20世纪30年代，在沙翁辞世数年后，如皋被评为中华第一大县。其间上海的英文报纸，有专文报道如皋商人，赞誉如皋人的enterprise（企业、事业心），如皋商人的诚信、敬业精神，由此扬名海外。

源自如皋乡贤诚信的长度、厚度、宽度，才积淀出今天如皋诚信的温度。厚积薄发，历久弥坚，新时代的如皋，才会涌现出丛慧玉、陈伟等诸多诚信楷模。